

【土地问题】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影响： 替代或互补

牛坤在¹, 许恒周¹, 迟旭²

(1. 天津大学 管理与经济学部, 天津 300072; 2. 中国人民大学 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分别作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在不同程度上影响农户农地的转出行为。从制度理论出发,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考察了二者在农地转出进程中的相互作用机制及异质性,分析了二者存在的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研究发现: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规模对农地转出的相互作用不显著,而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均能显著提高农地转出概率,并且二者在总体上出现功能重叠,即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替代效应。但是随着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数量增加,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强度分别发挥法律保障和社会保障功能,其替代效应逐渐不显著,且呈现互补效应趋势。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的交互项对农地转出对象和农地转出租金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宗族网络显著提高了农地转向村外人的概率。从制度运行视角出发,引导减弱宗族网络对农地交易的干预和增强其对劳动力转移的作用,对进一步释放农地确权的政策效应,推动农地流转具有重要意义。此外,亟须进一步探索非正式制度对农地市场化交易的作用机制。

关键词:农地确权;宗族网络;农地转出;替代效应;互补效应

中图分类号:F301.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465(2022)03-0139-12

一、引言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推手。早在1984年中央一号文件就提出允许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此后,农地确权、“三权分置”等一系列土地产权制度改革被视为推动土地流转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的正式制度基础。“十四五”规划再次强调深化农业农村改革,要求进一步放活农村承包地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虽然在产权制度改革历程中,我国农村土地流转规模不断增加,从2007年的0.64亿亩上升至2018年的5.39亿亩,但是近年来农地流转速率开始放缓,我国农业经营小规模格局并未发生明显改善^[1-2]。长期以来,我国农地流转市场呈现需求大于供给的态势^[3],激励农户转出农地对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发育至关重要。因此,持续关注农地转出问题对推动农地流转市场发展、实现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和助推乡村振兴战略实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农地确权从政策层面赋予和保障农户家庭土地产权安全性、稳定性和完整性^[4],作为正式产权制度的代理变量影响农户行为。但从制度理论出发,制度系统包含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两个重要内容。前者通过国家和政府的力量,依靠法律、法规和规制等途径发挥作用,后者一般由宗教、文化、习俗和关系等因素组成^[5-6],依靠传统型权威、个体互动等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

收稿日期:2021-07-0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农户生计多样化视角下农地确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及优化路径研究”(17BJY090);天津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替代抑或互补:土地流转中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2020YJSS020)

作者简介:牛坤在,女,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博士生;许恒周(通信作者),男,天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不成文的规范影响农户的经济行为^[7]。二者的关键区别在于正式制度由政府设计和执行,而非正式制度存在于私人领域^[8]。中国农村是一个传统的关系型社会,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的一员,其行为不仅受到正式规则的约束,往往还受到农村社会关系网络的影响^[9]。因而这决定了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既受到土地产权制度安排的影响,又与农村社会习俗、人际关系等非正式制度密切相关。其中,宗族网络作为中国农村典型的组织形式^[10],其形成的资源配置方式和文化传统是村庄地权自发变更的重要实现机制^[11],且有助于克服非正式制度指标选取的内生性问题并减少测量误差,被视为非正式制度的代理变量,也逐渐成为土地问题研究的热点话题。因此,在农地流转问题的分析中,同时考虑农地确权与农村宗族网络,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具有实际意义,也有助于为促进农地流转提供政策建议。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分别通过各自的运行逻辑对农地流转产生影响。学术界对以农地确权为基础的土地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地流转的相关研究存在争议^[12]。主流观点认为,农地确权颁证能够通过传导激励机制,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市场^[13-14],其作用机制主要包括农地产权保护^[15]、农村劳动力非农转移^[2]、交易费用机制^[16]等。相反的观点认为,当前的研究普遍高估了农地确权的积极作用^[12],原因包括忽视了人格化财产交易中产生的禀赋效应^[17]、农地确权无法进一步提高农户的土地产权安全感知^[18]等。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得到了普遍认同。既有研究认为,宗族网络通过为农户转出农地提供更充分的信息^[19]和人际关系约束保证^[20],能够降低农地流转交易成本,提高土地流转率。

此外,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分别具备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特征,而不同制度形式之间可能存在功能上的重叠或差异,从而呈现出替代或互补关系,这使得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在影响农地转出时可能存在复杂的互动关系^[21-22]。然而鲜有研究将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纳入同一框架,从二者的交互效应出发,探究农地转出问题。钟文晶等^[23]的研究与本文主题类似,分别以国家农地确权政策和农村社区人际信任为具体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表征,通过分析农户调查数据发现,二者的交互项对农户农地转出面积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得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互补关系的结论。但是在研究数据方面,采用广东省农户调查数据,具有区域限制性;在研究内容方面,未阐释不同制度形式关系的具体机制。

鉴于此,本文关注三个核心问题:其一,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单独影响如何;其二,不同制度形式在土地转出问题中是否呈现替代效应或互补效应;其三,上述影响是否在不同情境中存在差异。因此,本文在理论分析农地确权(正式制度)和宗族网络(非正式制度)在农地转出中的互动关系基础上,基于西南财经大学2015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数据,实证检验二者对农地转出的交互作用,判断二者是否在农地转出过程中表现出明显的替代或互补关系,并考察基于不同情境的异质性,提出有利于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促进的政策建议,助力乡村振兴。本文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弥补既有研究的不足:一是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的影响结论尚未达成一致,宗族网络与农地转出问题的研究仍然较少,本文对此分别做进一步实证检验;二是当前研究缺少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交互作用的理论与实证分析,虽然单独考察二者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具有较强的针对性,但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不同制度形式的联合作用对农地转出影响的完整性,以及不同制度形式在农地转出过程中的互动逻辑。

二、理论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创始人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包括人类用来决定人们相互关系的正规制约和非正规制约,二者存在修改、补充等相互作用关系^[24]。学术界围绕不同制度

形式的互动关系主要产生了两种观点:相互替代或相互补充^[22]。按照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划分,一种观点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存在功能上的重叠,即呈现替代关系。如 Tsai^[25]对中国316个乡村的调查案例研究发现,当正式的问责制度薄弱时,地方官员可以通过非正式的规则和规范来建立和执行他们的公共义务。另一种观点认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能够相互弥补不足。在中国乡土社会,非正式制度内生于农村生产生活实践,通过发挥其“本土优势”弥补正式制度在农村社会应用中的不足。反过来,正式制度因其强制性和确定性特征,弥补非正式制度的脆弱性和软弱性^[26]。二者相互补充、互相支撑,呈现互补关系^[27]。具体到农地转出问题,农地确权(正式制度)与宗族网络(非正式制度)既可能存在功能重叠,也可能存在功能互补,这取决于农户家庭的劳动力转移情况。

(一) 替代效应

长期以来,宗族网络非正式制度的发展往往被认为是正式制度的缺失^[25]。在我国土地制度改革早期,农村土地产权制度不完善,未从法律层面清晰界定农户土地的权属关系。农户转出土地面临经济效益、社会保障和土地生态质量的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如流转租金难以收回、流转后再就业困难、租约到期后收回土地难度较大、农地非农化等^[28],这都抑制了农户的农地转出决策和农地市场化行为^[21]。而自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我国农村社会环境逐渐放宽,加之农村生产力水平在小规模家庭经营下缺少质的提升,为宗族力量的崛起提供了有利的内外条件,特别在南方农村,宗族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经济文化形态^[29]。宗族网络能够通过增强内部成员间的信任水平、促进信息交互以及严格的道德规范影响宗族内部成员的行为^[30]。一方面,个体通过血缘或姓氏辨别所属宗族,对宗族内成员赋予更多的信任^[31]。这会减少真实信息的保留^[30],降低农地转出过程中信息不对称带来的交易风险,进而促进农地转出。另一方面,宗族内含严格的道德规范,内部成员基于人际间的信任形成个人声誉。声誉机制能够有效降低农户违约的道德风险^[32],进而促进农地转出。因此,当农地产权不清晰时,宗族网络通过其非正式规范降低农地交易风险,促进农地转出,并且形成了典型的熟人交易。

但是,宗族网络下的农地转出往往基于人情交易,普遍表现为手续短缺、程序失范,容易导致农地转出中出现矛盾和冲突等问题^[33],通过农地确权政策举措激励农地流转市场化便成为政府和学界的重点关注内容。农地确权政策旨在通过确定土地位置、面积、产权主体权属范围等,赋予农户承包地流转、抵押担保等权能^[34],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农地产权不清晰、不稳定等问题,降低了农地交易风险,减少了农地交易成本。其与宗族网络通过降低农地交易风险促进农地转出的功能相互替代。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1: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呈现功能上的重叠,二者具有替代效应。

(二) 互补效应

农地确权作为自上而下的国家赋权,其政策目标之一便是通过强化产权强度激励普通农户参与农地市场化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而“人地联动”才是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发育的有效手段^[35]。只有降低农户外出就业时劳动力市场的就业风险,保障农户就业稳定,农地确权才能实现激励农户转出农地的政策目标。宗族网络在促进劳动力就业中起到“传帮带”的积极作用,即通过提供具体的工作信息、协助实际的劳动力转移以及提供直接的求职援助降低劳动力转移成本和失业的可能性^[36]。同时,宗族成员间相互赠送或往来礼金,不仅为农村劳动力转移提供资金支持,还有助于帮助宗族成员抵御风险,为劳动力转移提供了一种社会保险^[37]。因此,对于家庭劳动力有外出就业需求的农户而言,宗族网络能够弥补农地确权无法通过保障农户外出就业稳定性促进农地转出的缺陷,进而与农地确权形成功能互补。

同时,农地确权也将通过其法律强制性,弥补劳动力转移背景下宗族网络对农户行为的约束作用被弱化的不足。具体而言,随着城镇化、工业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农村劳动力大规模流

动,要素市场化改革也给外来人口向农村流动提供了机会。这重塑了乡村内部人口结构关系,改变了乡村治理格局,对宗族力量在农村社会中的重要性产生了严重的冲击^[38-39],导致宗族网络通过声誉、面子观念等对农户行为所发挥的约束作用缺乏强制力^[7]。而农地确权正式产权制度明确了承包地块、面积、合同和证书信息^[13],其为农地转出提供了准确、完整的土地产权信息,增强了农户承包经营权的排他性,有助于增强农地转出规范,并且为解决农地纠纷问题提供法律依据^[40]。因此,农地确权能够弥补劳动力向外转移时宗族网络的强制性不足问题,进而与宗族网络形成功能互补。

总之,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相互补充作用体现为:宗族网络能够弥补农地确权无法降低劳动力市场就业风险的缺陷,农地确权能够弥补劳动力流动背景下宗族网络作用弱化的不足。这与农户家庭有劳动力转移需求和转移人数较多的现状密切相关。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H2:随着家庭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出现功能上的差异,相互弥补不足,二者可能具有互补效应。

三、数据来源、变量描述与模型选择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主要来源于西南财经大学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该调查面向全国开展,每两年进行一次。2015 年数据调查涉及全国 29 个省(市、区)11654 个农村家庭样本。该数据库涵盖了调查样本的个人基本信息、家庭资产与负债、家庭收入与消费、土地和住房资产等内容。为刻画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户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本文选取其中已公开发布的家庭和个人数据。通过匹配数据、剔除关键变量缺失值和异常值后,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 9000 个。

(二) 变量描述

核心被解释变量:农地转出。由耕地经营权是否转给他人或机构进行定义,包括土地入股、合作和免费给他人种植等转出形式,属于二元虚拟变量。2015 年样本中,转出农地的农户家庭比例为 13.94%。

核心解释变量: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农地确权通过耕地是否取得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衡量。在有效样本中,2015 年已经取得农地确权证书的农户比例为 45.51%。

既有文献普遍从宗族网络规模和宗族网络强度定义宗族网络变量。姓氏和宗族祠堂分别为宗族网络规模和强度的常用衡量标准^[37,41]。家庭姓氏在村庄中所占人口比例越大,表示家庭宗族网络规模越大;祠堂或家谱往往与宗族集体行动相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宗族网络强度或凝聚力^[41]。鉴于数据可获性,本文参考潘炜迪和袁辉^[42]以及朱铭来等^[43]对宗族网络强度的定义,使用家庭层面 2014 年是否参与家族祭祖或扫墓等活动衡量宗族网络强度,并用有多少个血缘关系的亲戚住在这个村庄定义宗族网络规模。

控制变量:基于现有文献^[35,44-46]和数据可获性,本文在考察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时,还需考虑影响农地转出行为的其他因素,主要包括户主层面特征、家庭层面特征、地域层面特征。户主特征包括户主的性别、年龄、年龄的平方、文化程度和身体健康状况。家庭特征包括家庭农业收入占比、家庭务工情况、家庭劳动力规模、家庭农地资源禀赋、家庭收入水平。地域层面的特征主要指农户所在村庄所属的地域位置,用东、中、西部地区划分。不同地区的村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存在差异,将影响农户家庭的经济行为。主要变量的定义参见表 1。

表 1 变量定义与统计学基本特征

| 变量名称 | 变量定义 | 均值 | 标准差 |
|----------|---|----------|----------|
| 农地转出 | 是否将耕地转给他人或机构(是=1,否=0) | 0.139 | 0.346 |
| 农地确权 | 耕地是否有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是=1,否=0) | 0.455 | 0.498 |
| 宗族网络规模 | 有多少个血缘关系的亲戚住在这个村庄/城市(没有=1,1~3个=2,4~6个=3,6个以上=4) | 2.703 | 1.111 |
| 宗族网络强度 | 2014 年家庭是否参与家族祭祖/扫墓等活动(是=1,否=0) | 0.761 | 0.426 |
| 户主特征 | | | |
| 性别 | 户主性别(男性=1,女性=0) | 0.892 | 0.311 |
| 年龄 | 户主年龄 | 55.647 | 11.916 |
| 年龄的平方 | 户主年龄的平方 | 3238.525 | 1344.089 |
| 文化程度 | 户主文化程度(高中以上=1,高中及以下=0) | 0.024 | 0.154 |
| 身体健康状况 | 与同龄人相比户主身体健康状况(非常好=1,好=2,一般=3,不好=4,非常不好=5) | 2.840 | 0.995 |
| 家庭特征 | | | |
| 家庭农业收入占比 | 家庭农业收入/家庭总收入 | 0.126 | 0.206 |
| 家庭务工情况 | 家庭非农职业人数/家庭总人数 | 0.621 | 0.301 |
| 家庭劳动力规模 | 家庭劳动力人数(16~60岁)/家庭总人数 | 0.569 | 0.340 |
|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 | 家庭耕地面积/家庭总人数(亩/人),取对数 | 0.971 | 0.660 |
| 家庭耕地位置 | 耕地是否紧邻机耕路(是=1,否=0) | 0.535 | 0.499 |
| 家庭收入水平 | 家庭总收入/家庭总人数(元/人),取对数 | 8.763 | 1.238 |
| 地域特征 | | | |
| 村庄所属地域位置 | 东、中、西部(东部=1,中部=2,西部=3) | 1.974 | 0.799 |

(三)模型选择

为了验证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本文首先分别检验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单独影响。农地转出属于二元变量,本文选取二元 logit 模型,建立以下回归方程:

$$\ln \frac{P(\textit{transfer}_i)}{1-P(\textit{transfer}_i)}=\alpha+\beta \textit{tenure}_i+\delta \textit{control}_i+\varepsilon_i$$

(1)

$$\ln \frac{P(\textit{transfer}_i)}{1-P(\textit{transfer}_i)}=\alpha+\beta \textit{clan}_i+\delta \textit{control}_i+\varepsilon_i$$

(2)

式中, $\textit{transfer}_i$ 表示家庭 i 的农地转出行为; \textit{tenure}_i 和 \textit{clan}_i 分别表示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核心解释变量,二者对农地转出的影响可以通过待估系数 β 符号的正负和显著性来反映; $\textit{control}_i$ 为可能对农地转出产生影响的其他控制变量; ε_i 表示误差项。

其次,参考郑志刚和吕秀华^[47]、姜付秀和黄继承^[48]、陈建林^[49]等方法,通过加入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交互项,观察交互项回归系数判断两者的互补关系和替代关系,建立以下回归模型:

$$\ln \frac{P(\textit{transfer}_i)}{1-P(\textit{transfer}_i)}=\alpha+\beta \textit{tenure}_i\times \textit{clan}_i+\beta_2\textit{tenure}_i+\beta_3\textit{clan}_i+\delta \textit{control}_i+\varepsilon_i$$

(3)

如果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系数显著为正,且交互项回归系数为正,表明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都能够促进农地转出,且一个变量的边际效应随着另一个变量的增加而递增,即二者存在互补关系;反之,如果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表明一个变量的边际效应随着另一变量的增加而递减,即二者存在替代关系。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单独影响分析

本文首先对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单独作用进行了检验。表 2 报告了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规模、宗族网络强度对农地转出的单独影响。此外,借鉴李江一^[15]的方法,借助 2013 年和 2015 年 CHFS 数据,分别采用双重差分模型(DID)、倾向匹配和双重差分模型相结合的方法(PSM-DID)进行稳健性检验,数据处理过程中同样剔除了 2013 年及之前获得农地确权证书的家庭,以保证实验组和控制组在受到政策干预前具有同质性,还可以清晰地检验新一轮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的作用^①。结果均显示,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分别能够显著提高农地转出概率,支持了黄佩红等^[16]关于农地确权与农地转出,以及伍骏骞等^[50]关于宗族网络与农地流转的研究。而宗族网络规模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不显著。这一发现类似于章元^[51]、郭云南等^[37]的结论,即拥有社会网络的家庭不一定会使用这种网络,宗族成员间只有加强交流合作,才更有可能传递信息和更有意愿互相帮助。第(4)列的模型同时包括农地确权、宗族网络规模和宗族网络强度变量,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分别在 5%的水平上显著提高农户农地转出概率,计算平均边际效应分别为 0.018 和 0.019,即获取农地确权证书和处于较强的宗族网络将使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平均提高 1.8%和 1.9%。这一结果证实农地确权正式制度和宗族网络非正式制度都将对农地转出产生积极影响,因此接下来考察二者的交互作用。

表 2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单独影响

| 变量 | 农地转出 | | | |
|--------|-------------------|-------------------|-------------------|-------------------|
| | (1) | (2) | (3) | (4) |
| 农地确权 | 0.165*** (0.064) | | | 0.161** (0.064) |
| 宗族网络规模 | | -0.019(0.029) | | -0.024(0.029) |
| 宗族网络强度 | | | 0.179** (0.077) | 0.176** (0.077)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3.108*** (0.610) | -3.067*** (0.618) | -3.196*** (0.612) | -3.113*** (0.618) |
| 观测值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注:(1)*、**、*** 分别代表在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2)报告结果为回归系数;(3)括号内数字为异方差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替代效应分析

1. 基准回归结果

表 3 报告了加入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宗族网络规模的交互项后的回归结果。第(1)列和第(3)列汇报了只加入户主特征变量的回归结果,第(2)列和第(4)列分别汇报了同时加入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地区特征的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②。分析发现,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的交互项系数始终为负,且在 10%的水平上显著。这表明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的正向促进作用随着宗族网络强度的增强而降低,与之对应,农地确权也将削弱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促进作用。因此,总体来看,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在农地转出中存在显著的替代关系。此结论证实了假说 1,即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存在功能上的重叠,二者呈现替代效应。当农地产权法律保护作用较弱时,宗族网络强度大能够通过非正式权威降低农地交易风险,显著提高农地转出的概率;当农地产权法律保护作用逐渐增强时,宗族网络强度大对农地转出的积极作用逐渐被替

① 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结果省略,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② 限于篇幅,控制变量回归结果省略,如需要可向作者索取。

代。虽然宗族网络规模与农地确权的交互项系数同样为负,但不显著。宗族网络规模的回归结果解释与上文单独回归结果解释一致,即农户亲戚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其联系密切,因而并不一定影响农户行为。

表 3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交互影响

| 变量 | (1) | (2) | (3) | (4) |
|-------------|-------------------|--------------------|------------------|--------------------|
| 农地确权 | 0.323 ** (0.130) | 0.381 *** (0.134) | 0.269 * (0.160) | 0.273 (0.166) |
| 宗族网络强度 | 0.284 *** (0.102) | 0.307 *** (0.106) | | |
| 农地确权×宗族网络强度 | -0.256 * (0.147) | -0.284 * (0.152) | | |
| 宗族网络规模 | | | 0.031 (0.039) | -0.001 (0.040) |
| 农地确权×宗族网络规模 | | | -0.053 (0.055) | -0.040 (0.057) |
| 户主特征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家庭特征 | 未控制 | 已控制 | 未控制 | 已控制 |
| 地区特征 | 未控制 | 已控制 | 未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1.053 ** (0.503) | -3.271 *** (0.616) | -0.971 * (0.513) | -3.094 *** (0.620) |
| 观测值 | 9000 | 9000 | 9000 | 9000 |

2. 稳健性与内生性检验

本文通过分组回归对上述主要研究结论进行稳健性检验。表 4 报告了分组回归结果,当宗族网络作用薄弱时,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而当农户处于未领取确权证书状态时,宗族网络强度在 1% 的显著性水平上提高农户转出农地的概率。这表明,宗族网络和农地确权存在功能重叠,即二者具有替代效应,与上文基准回归结果一致。因此,可以认为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替代效应结论稳健。

表 4 分组回归检验

| 变量 | 宗族网络强度弱 | 宗族网络强度高 | 未确权组 | 已确权组 |
|--------|-------------------|--------------------|--------------------|--------------------|
| 农地确权 | 0.421 *** (0.136) | 0.087 (0.073) | | |
| 宗族网络强度 | | | 0.315 *** (0.108) | 0.023 (0.110)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2.292 * (1.211) | -3.187 *** (0.710) | -2.290 *** (0.804) | -4.057 *** (0.938) |
| 观测值 | 2150 | 6850 | 4904 | 4096 |

对宗族网络变量而言,相对于中西部或北部省份,宗族在福建省、江西省、广东省等中国东南部省份更普遍^[37]。作为一种文化,宗族在各省份之间存在较大差异。如果地域文化是影响农户行为的重要因素,又与宗族网络相关,那么遗漏地域文化将带来遗漏变量偏误^[52]。为解决这一内生性问题,本文参考林建浩等^[52]的做法,引入省份固定效应,刻画省份之间不可观测的文化异质性,同时,引入村级固定效应进行检验,得到的实证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认为上述基准回归结果可靠性较高。回归结果见表 5。

表 5 考虑宗族网络的内生性检验结果

| 变量 | (1) | (2) | (3) |
|-------------|--------------------|------------------|--------------------|
| 农地确权 | 0.378 *** (0.138) | 0.412 ** (0.164) | 0.412 ** (0.164) |
| 宗族网络强度 | 0.250 ** (0.110) | 0.092 (0.129) | 0.092 (0.129) |
| 农地确权×宗族网络强度 | -0.300 * (0.155) | -0.329 * (0.180) | -0.329 * (0.180)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省份固定效应 | 已控制 | 未控制 | 已控制 |
| 村级固定效应 | 未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4.296 *** (0.889) | -1.872 * (1.092) | -2.552 *** (0.953) |
| 观测值 | 9000 | 6614 | 6614 |

(三)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互补效应分析

假说 2 提出,随着家庭劳动力转移人数增加,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可能逐渐体现出互补效应。因此,本文将农户按照家庭劳动力转移情况划分,分别对不同组别农户家庭进行回归估计,以探究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互补效应机制。在界定劳动力转移概念方面,孙小宇等^[53]以及陈媛媛等^[54]将其定义为农村劳动力离开户口所在的乡镇(街道)务工或经商;郭云南等^[37]将其定义为外出打工,即离开本村去省内城里、外省或境外;李江一^[15]采用家庭成员中从事非农业劳动的比例衡量劳动力转移。基于既有文献,本文分别按照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户口与所居住乡镇或街道不同)、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劳动比例的四分位数划分子样本。考虑到上述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规模的交互效应不显著,本文仅检验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的互补效应。

表 6 汇报了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结果显示,无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农户家庭群组中,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表现出显著的替代效应,这一结果依然显著。而在有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农户家庭群组中,控制省份和村级固定效应后,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交互项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即二者表现出显著的互补效应。当家庭非农劳动比位于 75% 以下分位数时,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强度呈现显著的替代效应,但随着家庭非农劳动比增加,二者呈现互补效应趋势。上述结果证实了本文提出的研究假说 2,即随着家庭劳动力向外转移,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户土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呈现功能互补趋势。其具体机制是宗族网络对转移劳动力在城市社会发展中起到了社会保障作用,同时降低了对其在农村社会行为的约束作用,而农地确权从法律层面保障了农户土地产权安全,规范了农地交易行为,二者相互支撑,共同促进农地转出。

表 6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不同类型农户家庭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

| 变量 | 按照是否有家庭成员外出分组 | | 按照家庭成员从事非农劳动比例的四分位数分组 | | | |
|-------------|----------------------|----------------------|-----------------------|-------------------|-------------------|------------------|
| | 无家庭成员外出 | 有家庭成员外出 | 0~25% | 25%~50% | 50%~75% | 75%~100% |
| | (1) | (2) | (3) | (4) | (5) | (6) |
| 农地确权 | 0.593*** (0.183) | -1.842*** (0.691) | 0.585 (0.38) | 0.703 (0.48) | 1.258** (0.58) | 0.512 (0.39) |
| 宗族网络强度 | 0.165 (0.143) | -0.836* (0.457) | 0.302 (0.29) | 0.475 (0.37) | 0.252 (0.42) | 0.087 (0.33) |
| 农地确权×宗族网络强度 | -0.468** (0.199) | 1.743** (0.735) | -0.686* (0.41) | -0.918* (0.51) | -1.128* (0.60) | -0.051 (0.44)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省份固定效应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村级固定效应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2.581*** (0.986) | -1.711 (3.349) | -3.258* (1.74) | 2.275 (2.34) | -2.424 (2.69) | -2.967 (2.95) |
| 观测值 | 5427 | 492 | 1174 | 872 | 709 | 884 |

五、进一步分析

上述研究主要关注了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即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在农户转出农地行为中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却没有讨论在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的互动关系。因此,本部分关注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流转市场化形式的互动关系,分别将农地转出对象(划分为转给村内人和村外人两种类型,分别对应“关系型”交易和“市场型”交易,赋值为 0 和 1^[23])和农地转

出租金作为被解释变量。如果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交互项系数显著为正,则认为二者存在互补效应,并同时存在能够促进农地流转的市场化;反之,则认为二者存在替代效应。

表 7 汇报了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对象、农地转出租金的影响。结果发现,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强度、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规模的交互项系数均不显著,这表明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对象的选择和农地转出租金并不存在显著的互动关系。此外,表 7 第(1)列的回归结果显示,宗族网络强度能够提高农地向村外人流转的概率。可能的原因是宗族内部成员出于营利性动机参与农地流转,并且在宗族活动较积极的地区更容易产生集体行动,发生农地的集中连片流转,这使得农地转向外来企业或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交易成本更低,进而提高农地向村外人流转的可能性。

表 7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对象、农地转出租金的影响

| 变量 | 农地转出对象 | | | 农地转出租金 | | |
|-------------|-----------|-----------|---------|------------|------------|------------|
| | (1) | (2) | (3) | (4) | (5) | (6) |
| 农地确权 | 0.538 * | 0.701 | -0.239 | 0.107 | -0.142 | -0.490 |
| | (0.297) | (0.575) | (0.659) | (0.196) | (0.394) | (0.468) |
| 宗族网络强度 | 1.325 *** | 1.445 *** | -0.031 | -0.212 | -0.352 | |
| | (0.304) | (0.432) | (0.142) | (0.221) | (0.297) | |
| 宗族网络规模 | 0.071 | | | 0.008 | | -0.100 |
| | (0.110) | | | (0.085) | | (0.107) |
| 农地确权×宗族网络强度 | | -0.240 | | | 0.302 | |
| | | (0.627) | | | (0.424) | |
| 农地确权×宗族网络规模 | | | 0.236 | | | 0.227 |
| | | | (0.208) | | | (0.159) |
| 控制变量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省份固定效应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村级固定效应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已控制 |
| 常数项 | -1.418 | -1.271 | -1.286 | -5.678 *** | -5.509 *** | -5.264 *** |
| | (2.865) | (2.854) | (2.921) | (1.789) | (1.763) | (1.768) |
| 观测值 | 513 | 514 | 513 | 1253 | 1255 | 1253 |

六、结论与政策涵义

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的农地流转效应分别受到了各方关注,而二者分别具备的正式制度特征和非正式制度特征并没有受到重视。本文基于制度的不同形式视角,不仅检验了农地确权正式制度与宗族网络非正式制度对农地转出的单独影响,还进一步考察了二者在农地转出中的交互效应,具体分析了其呈现的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相比既有研究更具完整性和系统性。研究结论如下:首先,获得农地确权证书和积极参与宗族活动能够提高农地转出概率,而较大的宗族网络规模并不显著影响农地转出。其次,从整体看,当农地产权法律保障较弱时,宗族网络强度对农地转出的作用更强,二者功能重叠,即农地确权(正式制度)与宗族网络(非正式制度)对农地转出呈现替代效应;随着农户家庭劳动力转移比例增加,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分别起到法律保障和社会保障功能,其在农地转出中呈现互补效应趋势。最后,农地确权和宗族网络未在促进农地流转市场化进程中呈现显著的互动关系,但宗族网络能够促进农地转给村外人,这一发现与宗族网络促进农地在村内熟人间流转的观点不同。

由上述研究结论得出的政策启示如下:首先,农地确权作为一项国家赋权的正式制度,在法律层面保障农户农地产权,为农户转出农地奠定了产权基础,宗族网络作为农村典型的非正式权威,同样能够促进农户转出农地。但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对促进农地转出存在降低土地交易风险的相同功能,在总体上呈现替代关系,其同时增强会削弱双方对农地流转的单独促进作用,将减弱农地确权促进土地流转的制度效果。因而,随着中国农地确权工作的全部完成,农村土地产权安全稳定逐渐得到法律保障,要格外重视农村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制度所发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其次,随着家庭劳动力转移,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分别发挥法律保障与社会保障功能,其替代效应不再显著,且呈现互补效应趋势。因而,应引导减弱宗族网络在农地交易环节的保障作用,适当提高其在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降低劳动力市场风险和不确定性的积极作用,以补充农地确权正式制度的不足,构建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支撑的有效机制,实现提高土地流转率的制度目标。最后,宗族网络提高了农地转向村外人的概率,非正式制度在农地市场化流转中可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而,亟须进一步探索非正式制度影响农地流转市场转型的机制。

当然,使用面板数据考察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相互作用将得到更令人信服的结论,但2013年CHFS数据样本中的宗族网络变量缺失值较多,这将损失大量样本。因此,本文主要基于2015年CHFS横截面数据分析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在农地转出中的相互作用关系。利用面板数据更好地识别农地确权与宗族网络对农地转出的相互作用及其机制是本研究有待改善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徐章星,张兵,刘丹.市场化进程中社会网络对农地流转的影响研究[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0(6):134-147.
- [2] 冯华超,钟涨宝.新一轮农地确权促进了农地转出吗?[J].经济评论,2019(2):48-59.
- [3] 钱忠好.农地承包经营权市场流转:理论与实证分析——基于农户层面的经济分析[J].经济研究,2003(2):83-91,94.
- [4] 程令国,张晔,刘志彪.农地确权促进了中国农村土地的流转吗?[J].管理世界,2016(1):88-98.
- [5] Steer L, Sen K. Formal and Informal Institutions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Case of Vietnam[J]. World Development,2010,38(11):1603-1615.
- [6] 胡珺,宋献中,王红建.非正式制度、家乡认同与企业环境治理[J].管理世界,2017(3):76-94,187-188.
- [7] 李芬妮,张俊飏,何可.替代与互补:农民绿色生产中的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J].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33(6):51-60,94.
- [8] Williamson C R. Informal Institutions Rule: Institutional Arrangements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J]. Public Choice,2009,139(3):371-387.
- [9] 郭云南,姚洋,Jeremy Foltz.宗族网络与村庄收入分配[J].管理世界,2014(1):73-89,188.
- [10] Sharma K L. Is there Today Caste System or there is only Caste in India[J]. Polish Sociological Review,2012(178):245-263.
- [11] 仇童伟,罗必良.“好”的代理人抑或“坏”的合谋者:宗族如何影响农地调整?[J].管理世界,2019,35(8):97-109,191.
- [12] 罗必良,张露.中国农地确权:一个可能被过高预期的政策[J].中国经济问题,2020(5):17-31.
- [13] 丰雷,李怡忻,蒋妍,等.土地证书、异质性与农地流转——基于2018年“千人百村”调查的实证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20,18(1):1-24.
- [14] Macours K, Janvry A D, Sadoulet E. Insecurity of Property Rights and Matching in the Tenancy Market[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2004,54(7):880-899.
- [15] 李江一.农地确权如何影响农地流转?——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新证据[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 2020(2):146-156.
- [16]黄佩红,李琴,李大胜.新一轮确权对农户农地转出的影响机理[J].农村经济,2019(5):17-28.
- [17]罗必良.从产权界定到产权实施——中国农地经营制度变革的过去与未来[J].农业经济问题,2019(1):17-31.
- [18]Bezu S, Holden S. Demand for Second-stage Land Certification in Ethiopia: Evidence from Household Panel Data [J].Land Use Policy,2014,41:193-205.
- [19]边燕杰,张文宏.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J].中国社会科学,2001(2):77-89,206.
- [20]李朝柱,石道金,文洪星.关系网络对土地流转行为及租金的影响——基于强、弱关系网络视角的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0(7):106-116.
- [21]孙小龙,郭沛.风险规避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基于吉鲁陕湘4省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J].中国土地科学,2016,30(12):35-44.
- [22]李芬妮,张俊飏,何可.非正式制度、环境规制对农户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基于湖北1105份农户调查数据[J].资源科学,2019,41(7):1227-1239.
- [23]钟文晶,韩璐琦,陈婷.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地权交易中的互动逻辑[J].学术研究,2021(4):87-94.
- [24]道格拉斯·C·诺斯.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刘守英,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4:3-7,64.
- [25]Tsai L. Solidary Groups, Informal Accountability, and Local Public Goods Provision in Rural China[J].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2007,101(2):355-372.
- [26]王淑芹,武林杰.法治与德治相结合的正当性证成[J].伦理学研究,2017(3):47-50.
- [27]崔巍,文景.社会资本、法律制度对金融发展的影响——替代效应还是互补效应? [J].国际金融研究,2017(11):13-22.
- [28]陈振,郭杰,欧名豪.资本下乡过程中农户风险认知对土地转出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安徽省526份农户调研问卷的实证[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18(2):129-137.
- [29]李成贵.当代中国农村宗族问题研究[J].管理世界,1994(5):184-191,220.
- [30]潘越,宁博,纪翔阁,等.民营资本的宗族烙印:来自融资约束视角的证据[J].经济研究,2019,54(7):94-110.
- [31]陈斌开,陈思宇.流动的社会资本——传统宗族文化是否影响移民就业? [J].经济研究,2018,53(3):35-49.
- [32]徐章星,张兵.中国农地抵押的德·索托悖论——基于抵押品功能的视角[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0(3):64-73.
- [33]杜威漩.论农地流转的非正式制度嵌入性[J].求实,2012(5):89-92.
- [34]徐志刚,高群,刘静,等.农地确权影响的再审视:理论逻辑与经验证据[J].农业经济与管理,2021(2):63-76.
- [35]高佳,宋戈.农村劳动力转移规模对农地流转的影响[J].经济地理,2020,40(8):172-178.
- [36]Foltz J, Guo Y, Yao Y. Lineage Networks, Urban Migr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20,48(2):465-482.
- [37]郭云南,姚洋.宗族网络与农村劳动力流动[J].管理世界,2013(3):69-81,187-188.
- [38]曾建霞,杨锦秀,廖开妍.富人治村能实现“先富带动后富”吗? ——基于四川省867个村庄的实证分析[J].农林经济管理学报,2020,19(6):769-778.
- [39]王朔柏,陈意新.从血缘群到公民化:共和国时代安徽农村宗族变迁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2004(1):180-193,209.
- [40]付江涛,纪月清,胡浩.新一轮承包地确权登记颁证是否促进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来自江苏省3县(市、区)的经验证据[J].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6(1):105-113,165.
- [41]Peng Y S. Kinship Networks and Entrepreneurs in China's Transitional Economy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4,109(5):1045-1074.
- [42]潘炜迪,袁辉.宗亲互助与商业健康保险需求[J].财经研究,2021,47(5):1-15.
- [43]朱铭来,郑先平,李涛.宗族网络、保险制度与农村女性外出就业——基于CFPS数据库的空间计量实证分

- 析[J].经济科学,2019(4):105-117.
- [44]李虹韦,钟涨宝.农地确权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基于确权制度可信度的调节效应分析[J].资源科学,2020,42(9):1657-1667.
- [45]张景娜,张雪凯.互联网使用对农地转出决策的影响及机制研究——来自 CFPS 的微观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0(3):57-77.
- [46]孙小龙,郜亮亮,郭沛.村级产权干预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基于鲁豫湘川四省的调查[J].农业经济问题,2018(4):82-90.
- [47]郑志刚,吕秀华.董事会独立性的交互效应和中国资本市场独立董事制度政策效果的评估[J].管理世界,2009(7):133-144,188.
- [48]姜付秀,黄继承.经理激励、负债与企业价值[J].经济研究,2011,46(5):46-60.
- [49]陈建林.家族所有权与非控国有股权对企业绩效的交互效应研究——互补效应还是替代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15(12):99-114.
- [50]伍骏骞,齐秀琳,范丹,等.宗族网络与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J].农业技术经济,2016(7):29-38.
- [51]章元,李锐,王后,等.社会网络与工资水平——基于农民工样本的实证分析[J].世界经济文汇,2008(6):73-84.
- [52]林建浩,吴冰燕,李仲达.家庭融资中的有效社会网络:朋友圈还是宗族?[J].金融研究,2016(1):130-144.
- [53]孙小宇,郑逸芳,许佳贤.外出从业经历、农地流转行为与农村劳动力转移——基于 CHIP2013 数据的实证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1(3):20-35.
- [54]陈媛媛,傅伟.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劳动力流动与农业生产[J].管理世界,2017(11):79-93.

(责任编辑:刘浩)

Impact of Farmland Certification and Lineage Network on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Substitute or Complement

NIU Kunzai, XU Hengzhou, CHI Xu

Abstract: Farmland certification and lineage network affect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 behavior to varying degrees, as representatives of formal and informal systems respectively. Starting from institutional theory, this paper is based on 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 focuses on the interaction mechanism between the two in the process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tests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and complementary effect. The study finds that both farmland certification and lineage network strength can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probability of farmland transfer out. They have a substitution effect on farmers' farmland transfer behavior. However,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rural household labor transfers, land certification and lineage network intensity can perform legal guarantee and social security functions, and the substitution effect of both farmland certification and the strength of lineage network gradually becomes insignificant, and shows a trend of complementary effects. What's more, the interaction items between farmland certification and lineage network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object of farmland transfer and farmland transfer fees, but the lineage network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probability of farmland turning to outsider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ystem operation, the effort made at guiding the weakening of the lineage network's intervention in farmland transactions and enhancing its role in labor transfer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further releasing the policy effect of the farmland certification and promoting the transfer of farmland. In addition, it is urgent to further explore the mechanism of the informal system on the market-oriented transactions of agricultural land.

Keywords: Farmland Certification; Lineage Network; Farmland Transfer; Substitution Effect; Complementary Effect